

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

先秦秦汉

黄岳洲 茅宗祥 主编

文学卷

XIANQINQINHAN
WENXUEJUAN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黄岳洲 茅宗祥 主编

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

先秦秦汉文学卷

XIANKQINQINHAN WENXUEJUAN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先秦秦汉文学卷/黄岳洲,茅宗祥主编.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6

ISBN 7-5432-0690-0

I.中... II.①黄...②茅... III.①古典文学—鉴赏—中国—先秦时代—辞典②古典文学—鉴赏—中国—秦汉时代—辞典 IV.I206.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012 号

责任编辑 刘 征

装帧设计 钱自成

技术编辑 徐雅清

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 先秦秦汉文学卷

黄岳洲 茅宗祥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字数 463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4 100

ISBN 7-5432-0690-0/I·126

定价 33.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公司管理部联系。T: 56628900×813

先秦秦汉部分

首席顾问 汤恩佳
顾 问 饶宗颐 何沛雄 叶嘉莹 霍松林 徐中玉
王运熙 顾易生
编 委 王国安 周正逵 徐应佩 雷应行 刘 凌
曹林娣 江凯波 黄岳洲 茅宗祥

三国两晋南北朝部分

首席顾问 汤恩佳
顾 问 饶宗颐 何沛雄 叶嘉莹 霍松林 徐中玉
王运熙 顾易生
编 委 王国安 江凯波 徐应佩 雷应行 刘 凌
顾景祥 黄岳洲 茅宗祥 曹林娣

隋唐五代部分

首席顾问 汤恩佳
顾 问 何沛雄 刘国正 吴调公 陈贻焮 陈绪万
周振甫
编 委 吴企明 周正逵 高克勤 江凯波 钟元凯
陆嘉明 傅美琳 黄岳洲 茅宗祥

宋金元部分

首席顾问 汤恩佳
顾 问 何沛雄 刘国正 吴调公 陈贻焮 陈绪万

周振甫

编委 吴企明 周正逵 徐育民 钟元凯 曹林娣
傅美琳 黄岳洲 茅宗祥 江凯波

明清部分

首席顾问 汤恩佳
顾问 何沛雄 康来新 钱仲联 李行健 邓绍基
冯其庸 姜书阁
编委 吴新雷 褚斌杰 周溶泉 丰家骅 江凯波
沙宝祥 黄岳洲 茅宗祥

本册撰稿人

聂石樵 尹建章 黄岳洲 陈贻焮 周蒙 孙绿怡
郭豫衡 霍旭东 梁宗奎 徐仲涛 顾易生 汪涌豪
朱安群 周巨山 王达津 曹础基 汪玢玲 张啸虎
马积高 袁珂 董治安 王洲明 龚克昌 唐子恒
张建业 王以宪 姜书阁 姜逸波 王运熙 邬国平
石宏宽 郑学弢 何沛雄 王廷珍 袁家浚 董治安
段熙仲 吴汝煜 张可礼 王青 吴功正 陆志平

出版说明

“中华古籍浩如烟海”，是我们十分耳熟的一句话。不过，经过历史长河的洗汰，真正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占的比例并不很高；换句话说，作为一个有文学修养的国人，所应该掌握、熟读的篇章量并不很大。这些，从历代众多的选本都把视线集中在部分篇目上也可窥见端倪。有感于此，我们请著名古代文学专家黄岳洲、茅宗祥二位先生编选了本书，把历代闪光的名篇相连成串，提供读者阅读方便，并约请海内专家对入选名篇进行鉴赏。

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都是在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卓有建树的专家教授。仅以先秦秦汉卷为例，即以治先秦诗文享誉海内的聂石樵、黄岳洲、王达津等先生，以治赋学闻名的马积高先生，以研究神话蜚声学界的袁珂先生，研究汉乐府硕果累累的王运熙先生等。其他各卷，莫不如此。正因为这些专家亲自撰写，犹如院士撰写科普文章一样，作者多年研究的心得都在文中得到体现，使每篇鉴赏既有高超的识见，又能深入浅出，为读者理解原作提供了方便。同时，为使读者在阅读名作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本书在部分文学史分段后附录有有关专家撰写的介绍文章，读者可以比照阅读。

根据文学史的常规分段，《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分为先秦秦汉文学卷、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卷、隋唐五代文学卷、宋金元文学卷、明清文学卷，各卷中又以文体分类，以清眉目。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二月

怎样鉴赏文学作品（代序）

黄岳洲

鉴赏文学作品，不是就事论事、低级、简易地囿于固有理论的活动，而是专门学问。它既要研究传统文化，又要研究特定时代的文化，还要研究作者的特殊条件。从宏观到微观，才能对作品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赏析鉴别，从而作出历史的、审美的、科学的评价。似乎可以认为，它是建立文艺理论和文学理论的基础或条件，而对已有的这些理论来说，往往能在某些方面起到或补充、或纠正、或升华的作用。再则，如果要理解某个作家的思想基础和艺术特征，有时候阅读切实的有价值的鉴赏文章较之阅读理论文章更为重要，因为有的理论文章难免简而不实、疏而不精，而且有的论文所说未当。例如：评论家说《荀子》跟《韩非子》一样，文章“著博喻之富”。我们检读《荀子》三十二篇，却只有第一篇《劝学》的前半部分是这样，第二十六篇《赋》也只得有一些比喻，其他都是结构严谨长于逻辑论证的文章。从风格看，《荀子》近似《墨子》。好的鉴赏文章对于把握作家作品的特点，对于总结各种艺术规律，对于使读者心领神会潜移默化，陶冶性情，培养高尚品德，提高审美能力，作用巨大，而且这种切肤之感往往是文艺理论所不可比拟的。

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必须有识。“识”，或“见解”，或“看法”，或“观点”，或“眼光”，其实就是“高见”或“创见”或“洞察力”，能从质的方面发人之未发，见人之未见。它由特定的智质、知识、能力、思想、经验、机遇、阅历、方法等所组成，是由诸多因素酿成的智慧的闪光。鉴赏作品的“识”主要表现在对作品的内容、形式、风格、源流、价值等进行本质的辩证的独具慧眼的分析鉴赏，从内容和艺术两个方面作出评价。

鉴赏评价作品的内容，首先要明确文学与功利的关系，是功利

的,还是非功利的?回答是肯定的。从文学诞生之日起,初民就是为了认识并说明事理,为了娱乐,为了表现自己的力量,为了抒发自己的情绪与愿望。后来的整个文学史无不如此。但它不是一般的“工具”,必须具备文学的要素。正因为它是功利的,鉴赏作品必须善于扬善抑恶,弘扬民族精神,振奋民族意识,为振兴中华服务。在与自然斗争方面,我们要称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要称颂李白的“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要称颂张衡、郦道元,特别要称颂写《神灭论》的抗命齐竟陵王的范缜。在爱国主义方面,我们要称颂苏武、辛弃疾、文天祥等。在反暴政方面,我们要称颂李贽、方孝孺、洪秀全、谭嗣同等。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我们要称颂贾谊文、司马迁文、曹操诗歌以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龚自珍的《己亥杂诗》、梁启超的《志未酬》,等等。我们尤其需要继承并发扬硬骨头精神,那些为国家为人民为科学而赴汤蹈火、舍生取义的先哲们彪炳千秋,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朱东润师生前曾经对笔者讲过:“南宋文天祥、陆秀夫等人的作品尤其需要认真研究,陆秀夫背着小皇帝往海里跳,大义凛然,可与日月共辉。”为实现现代化而探寻民族的脊梁,才可以提高民族意识,增进民族观念,从而更快更好地作出巨大成绩。对形形色色的反封建意识和科学民主思想,应当加以褒扬,宣传,鼓励,诱掖,使之逐渐成为集体意识,主导思想,并上升为民族心理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必须重视张扬个性和为人生价值而呼唤的作品,如反映被污辱被损害的妓女的诗歌《莫攀我》和敢于与封建势力斗争并对抗的乐府民歌《平陵东》等。这些作品的社会价值很容易被忽视或贬低而局限于艺术欣赏。我们要恢复其应有的光华,予以足够的评价。只有注重人生价值,才有健壮强盛的民族精神。我们不能沉睡在子路、曾皙等人的“待坐”章里去安贫乐道,追求空幻的王国乐土,不能只是满足于欣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其他魏晋时代的山水诗,不能静态欣赏宋朝文学中某些纯理学的东西。徐中玉先生主张发掘中华民族长期赖以生存并发展的根,这是警世良言。有人认为文学必然服务于政治,

有人却认为文学跟政治无关，完全独立。其实，大多数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必然是现实主义的，离不开反映社会、反映人生，鼓舞社会、鼓舞人生。杜甫的“诗穷而后工也”，是说诗人经过穷困潦倒对人民疾苦体会得尤其深刻，因此能够“工”。司马迁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仆偿前辱之责，虽被万戮，岂有悔哉！”（《报任少卿书》）这些切身体察之言，肺腑之语，真正是道出了文学与社会和人生的关系。诚然，有的文学作品如《春江花月夜》和李白、高启等描写山河壮丽的诗篇等，并不能说是为哪一政治集团或阶级服务，我们的审美意识不能也不应该局限于阶级意识。有些作品也可以为全民所共赏。把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宝库发扬光大，用深邃的哲理、优美的形象、进步的伦理去启示人们乘风破浪，一往无前，从而提高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操，这是文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使命。庸俗的唯美主义者，怀着对历史认识的偏见，对传统文化思想的误解，对人民精神生活最大需求的无知，讲析古代文学作品时浑浑噩噩，了无所见，甚至陶醉在封建传统思想的网罗之中，或者一味崇洋，妄自菲薄，这些都应当加以排除。但是，怎样才算找到了科学的、有诱掖力的鉴赏方法？从哪一角度去鉴赏才是更为切实？什么才是正确的价值观？什么才是开展百家争鸣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僵化走向奋起的动力？等等，实在难以一概而论。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困难：第一，作品的作者不同，时代不同，所处环境不同，思想蕴含不同，特定的艺术手法不同。以孔、孟的作品而论，人们往往只是取其所需去崇敬或批判孔子，或者只提孔孟之道。其实孔子有他的特殊贡献，也有他在特定现实中的缺憾，这就需要如实地、全面地理解并分析孔子和他的作品，才能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又如孟子，他讲道德说仁义承道于孔子，但在人的价值观点上是对孔子的一次大革命，他既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又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尽心下》）又公开责骂梁襄王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梁惠王上》）。孟子在先秦哲学思想、文学创作上的地位应当提

高。正确具体地评价作家作品,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这里有作家的哲学观、伦理观、价值观、审美意识、性格特征、创作方法、语言基础等等的不同,也有社会政治势态、经济状况、生产方式、民族心理、民俗和文化传统、文艺思潮的差异。但我们要尽可能做到切合实际,既重视全局的剖析,也重视局部的考察,既不以偏盖全,也不以全掩偏,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才不至于淹没其光华所在。第二,从鉴赏者方面看,所处时代不同、经历不同、个性不同、兴趣爱好不同、知识不同、能力不同、想达到的目的不同,对作品所做的评价就有差异,或者有很大的差异,甚至是相反的观点。我们认为,只要不是政治立场或其他大是大非,不是宣扬神道鬼魅,都应该容许甚至鼓励其存在。唯我为是,轻易否定,不但不利于发展文学作品的鉴赏,也不是真正理解了作品本身是多种复杂因素的组合体。

艺术鉴赏,主要是就作品的艺术价值从作者的整个创作和(或)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的角度予以评价。作品的艺术价值是个综合体,由传统文化、特定文化、作者条件、立意、结构艺术、表现艺术和艺术风格诸种因素所构成。作品所写的事件或内容确定之后,其成败高下常常决定于作者的艺术素养与能力及其所运用的艺术手段。孟浩然的《春晓》、李白的《静夜思》所写事件极小,所表现的内容也是人们所熟悉的,可是一经作者巧思妙用,遂成金声玉振,千古流传,全在于取材角度精当、剪裁铺垫的合理和情景交融的表现艺术。因此,决定作品生命的往往是艺术。艺术鉴赏的方面很多,这里只能略举几例。

艺术贵在“羚羊挂角”,浑然天成。这是艺术修养高深、艺术技能臻于炉火纯青的表现。其中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不是依附凑合,而是从内容本身出发,内容有了这一形式,便能充分显现其性质与特色,如有玉之水,能见其折光;二是形式本身所用的诸多艺术手段与手法,裁剪合理,组合恰当,衔接自然,和谐无间,浑然一体,像芙蓉出水,不着泥污痕迹。能入此境,就是艺术精品。上述《春晓》和《静夜思》,写的是日常生活情景,用的是浅近易懂的语言和朴实无华的白描手法,却能协调映衬,形影

相随，互生互成；所用取材、选材、剪裁、色彩、粘联等艺术手段与手法，精当娴熟，无斧凿印痕而有巧夺天工之妙，从而既表现了人们所熟悉的生活，又升华了习以为常的认识，道出了现象的性质，获得了雅俗共赏的审美价值。又如杜甫所写大量律诗的声韵对仗要求既多且严，为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诗歌史所仅有，但在杜甫笔下却驾驭自如，成了咏叹哀乐抒发情怀的手段。那阴阳相间、清浊相对的声律，正好跟他的忠君爱国和对现实黑暗的不满情绪相协调，跟他的回旋往复沉郁顿挫的风格相一致，运用律诗这一形式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加上他有“读书破万卷”的文学和语言修养，就创作出了几乎不受任何形式束缚而又内容充实感人肺腑的律诗艺术，以其大手笔获得“诗圣”的高誉。凡是成功的艺术品，所用艺术手段和手法，不仅要与作品的内容相统一，而且还要深得其体；只有深得其体，才是真正的统一，才可以称为精当。同时，所用诸多艺术手段和手法，其自身必须是不着痕迹的整体，这固然需要作者具有高超的艺术技能，但作者的高尚情致往往起到更大的作用。如果只有前者，就缺乏生气，难成精品；只有后者，便成为没有文彩的作品。二者共有，则形神兼备，文质相养，既生气勃勃而又美感流溢，富有魅力，才能进入艺术胜境。

艺术贵在富有个性特色。个性指艺术个性，与作家的素质、文化思想修养、际遇和情致相通，成功的文学作品应当是诸种因素的结晶。有个性的，便有独特风格，而它又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如司马迁、三曹和杜甫、李白的作品以及南宋时代的作品。而且，成功的作品还往往有地方特色，这可以拿《离骚》作为代表。它不只运用了当地的方言和流传于民间的远古神话传说，而且还用了南方（楚地）的名花异草作为抒情言志的重要手段。它具有多种特色，成了我国古代诗坛文人作品的第一个高峰。文学作品是否有个性特色，这是在艺术上是否成熟的标准之一。凡有个性特色的作品，不仅有认识价值，更有审美价值，这才富有艺术生命。

艺术贵在创新，亦即具有新的立意、新的角度、新的艺术手法、新的艺术风格、新的文学样式。我国古代文学就是由不断创新而

发展起来的。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就其主体而论,应该说是一部文学的吐故纳新史。旧的作为一个功绩、一块碑石——一份艺术财富留下,新的在传统文化和特定文化环境中萌生成长,而在新旧对比中又显示了各自的价值。鉴赏作品艺术时,要善于发现作家的创造发明,哪怕是局部的、零星的,都应当重视,应当珍惜,在与原有的比较中充分肯定其价值,把它发扬光大。这些都是我国文学遗产中的宝贵财富。如上述的《离骚》,它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代诗坛的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峰,还在于它创作了前无古人的以“兮”字为衬词的“骚”体样式,而它所大量运用的排比铺陈手法和艳丽华美的词藻,又成了汉赋的先身。同理,尽管汉赋过分讲究形式,堆砌词藻,轻视内容,却要充分肯定它对赋这一新文体的产生所作的不小贡献,而且也对散文、诗歌等体裁的创作提供了推衍文思和铺排语言等方面的营养。又如睢景臣的散曲《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寡闻陋见的农民的口吻写刘邦衣锦还乡的情景,竭尽嘲讽调侃之能事,就因表现手法新颖而名列史册。

作品内容离不开形式,形式也离不开内容,鉴赏一般是同步进行,用的是综合法。由内容到形式(含篇章和艺术方法),这是较为常见的鉴赏顺序。

关于作品内容,前面说过有爱国的,有反封建的,有抒情的,有主题朦胧的等等,这是鉴赏的结果——从性质方面评价。不管哪种类型文学作品的内容,都是多种成分的融合体,为了明其主体,便有主题之说。鉴赏之初,所看到的是融合体,它主要由事、理、情、气(也跟篇章有关)四个方面组成。任何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以上四项,即使篇章也是这样。事、理、情三者之间,事是基础,理和情是事的抽象或升华。即使是叙事作品,也离不开理和情,特别是离不开理。文学作品从其内容而言,主要价值在于理和情。历来对理和情都特别重视,曹丕《典论·论文》说“书论宜理”,并批评孔融“理不胜辞”。刘勰《文心雕龙·序志》也说:“盖文王之作也,本乎道。”唐朝李翱说:“义不深,不至于理。”(《答朱载言书》)在儒家思想占正统地位的情况下,古人所说的“理”(或“道”),较多的是孔

孟之道。既有理论提倡,更有创作实践。荀子的《天论》,班彪、班固的辞赋,魏晋文人的诗歌,韩愈的《原道》、《原毁》,柳宗元的《封建论》,黄宗羲的《原君》以及宋朝理学家的诗,虽重宣传各式各样的理,而大量的还是理与情结合借情而给人灌之以理。《尚书·尧典》说:“诗言志。”志,士心也,也就是情。陆机《文赋》说:“诗缘情而绮靡。”《宋书·谢灵运传》说:“以情纬文。”不论是诗是文,都必须有“情”。“理”只是喻人的手段,“情”却是感人的手段,正好与文学特质相一致。以情感人,以理喻人,情理并行,将无坚而不摧,便能充分发挥文学的功能。钟嵘反对“理过其辞”,辞弱则情薄,则“淡乎寡味”(《诗品》),所述之理,也成徒劳。因此成功之作,大都是情理并存而且并茂,如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杜甫的《北征》、白居易的《长恨歌》等等。又如李密的《陈情表》看似以情为主,实质是以祖母日薄西山侍养已短作为理,婉拒司马氏之聘。还有诸葛亮《出师表》实际上也是以情明理。也有以情为主的,如蔡琰哀婉凄切的《悲愤诗》,文天祥爱国之情磅礴于宇宙的《正气歌》,等等。所以在鉴赏作品内容时需要注意其事、理、情三者的情况及其关系。事有的多,有的少;有的详,有的略;有的明,有的隐。这里都有个根据文旨需要如何取材、剪裁,如何表现的问题。广义地说,事便是情况。理有的为主,有的与情相融,有的为次(附丽于情),这里也有个如何处理的问题。情,也是这样。以理为主的作品,往往只有认识作用;情理并茂的作品既有认识作用,又有审美作用;以情为主的作品,富于审美作用。气,既有属内容部分,也有属篇章部分和语言部分,古代文论常把气作风格讲的,但也只能是风格之一。就内容而言,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说的是高尚的道德修养,跟上述的“理”相似。甚至也包括了“情”,但它比事、理、情三者更为抽象是一切“精华”的总汇。韩愈跟孟子一样,主张立言养气。名家名篇往往是气盛则文盛。有了“浩然之气”,就能理质而辞顺。和艺术手法、技能不同,气有时表现为特别具有逻辑论证力,例如《墨子》、《荀子》、《左传》、《战国策》、《论衡》里的一些文章。有时表现在明快自然不加雕琢却又

文词丰腴的诗文上,如建安风骨中曹植等的诗文和盛唐气象中李白的若干诗篇和提倡古风的陈子昂的少量诗歌等。气不盛则文不盛,如谢朓《至京邑赠西府同僚》便是这样。又如《观朝雨》开头“大江日夜流”等起句魄力遒劲、气势不凡,有曹子建遗风,往后则笔力薄弱,难以相续。钟嵘说:“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蹶,此意锐而才弱也。”其他六朝诗文内容单薄,词语华丽,也属于这一类。文采不足,如骈文崇尚词藻,刘桢由于对对偶、音律研究不够,作品就平淡乏力。陆机《文赋》认为作文难在“文不逮意”。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内容丰富多彩,多层次,多品第,而且程度不同地带有传统文化和时代的烙印,其表现手法也是多样的,高低粗熟不一,都需要我们通过赏析去加以鉴别。

风格,钟嵘《诗品序》称为“骨气”。或称“风骨”,一般文论家所说“建安风骨”、“盛唐风骨”,就是说的风格。《文心雕龙·风骨》:“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刘勰认为“风”是风貌,当是作家气质、知识、能力、哲学观、伦理观、审美意识和语言文学修养等方面反映于作品主题、结构、语言、艺术手法等的综合表现。法国作家布封说:“风格即就是本人,因此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又不能转借。”(《风格论》)“骨”,指气质内容,因此风骨就是风格,是作家作品成熟的标志,显示了特色;风格的异同,在比较中才能得以昭示。就其整体而言,有个人风格、时代风格、流派风格。个人风格主要跟作家的气质、才智、个性、际遇和对生活的独到认识等密切相关。如李白、杜甫同是盛唐诗人,但风格迥异。时代风格主要由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尚所决定。《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战国时代处士横议,神思飞扬,放言无忌,有如脱缰野马之不可拘抑,孟轲、韩非等人的文章风格就具有这个特点。至于广用物象进行比喻,又表现出一种论事明理的尖锐遒劲之力。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战国之文,深于比兴。”道出了又一时代特色。又如李白、杜甫虽有迥异的个人风格,然而又有境界开阔、神彩洋溢、富于气度的盛唐精神。流派风格,有的主要跟传统文化有关,如桐城派文宗

《尚书》、《左传》等，有古朴浑成之风；也有只宗一派或自成流派的，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还与特定的时代和文学主张与艺术崇信有关，如志在唱和拾芳的西昆体，便是杏花春雨、柔和绮丽的文学主张的体现，人们喻为江南娇女。风格，不可以一概而论，必须因时、因地、因条件因主客观环境而异，深沉与晓畅、豪放与婉约、华美与质朴、刚健与柔弱、等等，成因各异，各有所长又各有所短，各有所适又各有抵牾。而且当论及一个作家、一个时代、一个流派的风格时，又往往不是指全部作品，必须具体对待而撷取其主流或富有特色的倾向。

通过对作品内容、艺术和风格鉴赏，最后还要把它放到文化思想史和文学史和艺术史以及特定时代中去考察，从而作出历史的科学的评价来。鉴赏文学作品，我们既不主张沿用朴素的整体论，也不主张把作品的几个方面机械地割裂，因为前者无助于具体地深刻地认识作品、把握作品，后者不能从整体上理解并领悟作品的价值及其生命力，而堕入支离破碎不能得其体性。要运用现代科学的系统方法，凭借合理手段，对作品的本质内涵和存在价值作出应有的评价。我们欢迎从各种角度运用各种方法对作品进行创造性的鉴赏，对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语言特色进行深入的发掘，充分揭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精华，发挥其对认识生活、教育今人和陶情冶性等的审美作用，对某些作品还要注意探索其“模糊性”，揭示其朦胧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本书的鉴赏文章，有的可能偏于微观而少见整体感，有的可能立足于宏观而缺少具体分析，有的可能偏于抒发主观意识，有的可能着眼于艺术手法或语言特色，等等。我们既不提倡一有不足就全部推倒，也并不认为所有鉴赏文章都是完美无缺。我们主张抓主流，看发展。认识作品跟认识其他事物一样，总得有个从感性到理性逐步深化逐步提高的过程。我们虽然不能有约翰·洛克哲学的不可知论，不能赞成“诗无达诂”，却也得承认理解作品把握作品确有相当的难度。即使像韩愈那样深谙周公之文、周公之治，但由于时代不同、条件相异，韩愈也无从全部理解周公之文的使用价

值。不可能也不必要求对某一作品有划一无二的理解,否则就不是文学鉴赏而是下科学“定义”了。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和作为主观意识强烈的鉴赏者之间必然会有某些距离。没有或极少有一位鉴赏家能够把握或洞悉或理解作品创作过程中所有蕴藏的深广意义及其纷繁复杂的因素;作家自己,往往也很难恰如其分地说尽作品及其创作过程中的酸甜苦辣、来龙去脉。但是,作者和鉴赏者,鉴赏者和读者,这一时代和那一时代,这一民族和那一民族,这一社会和那一社会,甚至中国和外国,在形象感受、逻辑推论、心理激发、审美意识、道德情操、想像能力等方面,又常常有许多共同心理或相关意识,或近似习惯,这就是文学可以共同鉴赏的重要根据。因此,只要能够就作品的内容、艺术特色、风格流派、存在价值诸方面作出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解析与阐述,只要能够对作品进行美学的、伦理的、哲学的、方法的、古今中外比较的等多角度的阐述,或者是单角度、多层次的深入发掘,就是应当肯定或可供仿效的,就是一种“达诂”。有的作品客观效果超出创作动机,为作者所不知或少知或不深知或误知,却为鉴赏者所知之更广大更众多更深刻更精当,因而有所发现,有所光大,或有所纠正,有所深化,这便是在“达诂”中作出了新的贡献。因而,鉴赏作品不是没有高低优劣深浅之分,它取决于如前所述的“识”。一篇鉴赏文章只要在某一方面有“识”,独辟蹊径,新颖夺人,就是难能可贵,或者接近于识,或者取得了某一足以引起读者共鸣共兴趣的思考角度,也就是成功的了。

前 言

一切文学研究、文学教学、文学爱好，都离不开作品鉴赏。本书是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作鉴赏总汇，可供广大文学研究、文学教学、文学欣赏和文学进修者参考。

本书所选作家作品，以朱东润师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基础，做了一定的增、删、改、调。东润师主编的这一巨著，所选均为名家名作，流传广泛，影响极大。东润师一直以能有一部对其作诠释、鉴赏，既有学术性又有实用性的巨著问世为平生大愿之一。得悉我们准备编撰本书时，东润师容光焕发，精神大振，多次恳谈终日，提出很多高见，尤其认为南宋作品在爱国主义和题材、构思诸方面值得重视。东润师欣然承诺担任顾问，更想为本书撰稿、署端，可惜嗣后不久溘然长逝。老成凋谢，曷胜怆痛！努力为本书撰稿的有些名家、教授也已作古。我们深为悼念！我们战高温，冒严寒，万里奔驰，八易春秋，风雨晨昏未敢稍懈，忽然不知鬓发已霜！终于将本书编妥，可以鞠躬竭诚，安慰东润师和后世诸君英灵，更可以奉献于国内外读者。

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作总汇，我们认为，我国蔚为壮观的古代文坛，不仅由历代名家名作组成，不同时期的文学流派也是重要成因，因此补选了永嘉四灵和河朔诗派的作家作品；俗文学如戏曲、小说是宋代以降愈益兴盛的文学现象，也是文学发展大势所趋，有很多传世名作，也作了相应的增补，意在使本书能够勾画出我国古代文坛的大致轮廓。诚然，不尽人意之处尚多，敬候国内外专家、读者教正。

本书严格按照专家研究口径组稿，撰稿者约 500 人次，其中一流或知名教授近 300 人，相当于副教授职称的也是出类拔萃者。作者和顾问单位涉及国内各重点大学、一般大学、各文学研究所、